

夜郎史探



新 理 想 家



夜郎史探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孟筑敏
封面设计 石俊生
封面题字 刘宝静

夜郎史探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375印张 280千字 4插页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221-00731-4/K·17 定价6.50元

前言

“夜郎自大”贻笑百代，引起世人对夜郎产生浓厚的兴趣。由此，夜郎属哪个民族系统，来源如何，因何得名，在什么地方，政治、经济状况怎样，有哪些奇风异俗，文化遗物有否发现，以及和当代民族有无关系等等，都是人们议论的话题。

无庸讳言，我们作为夜郎故地上的历史研究机构，对弄清我们多民族国家历史成员之一的夜郎的全貌，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夜郎早已在流逝的时光中淹没，要经过钩沉使它显现，自非易事。为了尽一切可能逐步做好这件工作，我们于1978至1983年间举办了两次古夜郎史学术讨论会，又专门向国内一些精治古史地、民族的学界名流征集稿件，将与会者的讨论文章和征集的论著辑成3集《夜郎考》。这3个集子颇受各方垂青，兼之刊印量少，面世后迅即售完。近几年来国内外学人和有兴趣者常来函索购，无奈印版或残或毁，重印诸多困难。并且因原出3书中内容相重之文颇具数量，又有的为近来考古发现和民族研究进展判定立论有待进一步匡正的，加之近几年来好些研究者对夜郎勤耕不辍，继续撰写出较有新见的文论等原因，悉依旧样重印不仅难办，还不免繁冗、遗阙。可是各方人士对夜郎问题的关切，萦绕我们心头，企望酬答有日。今得贵州人民出版社的支持，我们将原3书撰著精选并添上新近研写而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数篇专文，

聚精集粹而成本书，以略报关切者们的厚望。

本书编选宗旨，以向社会各方人士报告夜郎研究现状为要务，但自应有点有面，干支分明。因而既要突出族属、地理、源流、文化遗存诸关键，又要照应到历史传说、经济状况、政治结构、风俗习惯、经验教训、与中央王朝和四邻关系等多个方面。准此，我们自当以研讨关键问题的文论为重心，尽量求全地配以探索其余各问题的专一撰著，加以汇纂。为了便于读者把握夜郎上下、内外一应情形，又特别选载了一两篇综述性文章，使读者能了解整个研究的动态，明了各问题的主次，知晓揭示夜郎全貌的契机。

总的来看，对夜郎本身及与之有关各方面的文论，本书虽未全收，但举凡具代表性者大体悉备。因本书篇幅有限，对有些论著在不损宏旨的前提下，将原稿中与夜郎关系不密切的文字作了删削。同时为增强另一些文论的科学性与严谨，对有出入的引文尽力加以校正。凡此，希冀谅解。

二

我国很早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 and 璀灿的文化具有多元性，为各族人民共同缔造。据可靠记载，夜郎在秦汉时代是西南夷地区一个人多地广的“最大”实体。一般地说，夜郎地区或夜郎国控制的地域，约略相当于汉代的牂柯郡，总面积不下20万平方公里。西汉时牂柯郡有15万余人口^①。而西南夷中另一以和夜郎国同“受王印”的滇国为中心的大群团，其所在的益州郡，至东汉时尚只有11万余人^②。与同时代的东南、岭南的几个大方国相比，夜郎的人口也要多于它们。岭南西汉南越王国本土的南海郡，仅有9万余人，包括秦时西呕国故地在内的西汉郁林郡，人口不逾8万^③，东南东越两部中的

东瓯王国，聚集的人口数只略多于4万^④，另一部闽越王国情况或与东瓯王国的相当。他们在武帝时被迁往淮南江北间，两国故地仅被置为会稽郡下辖的冶县，从《汉书·地理志》看，该郡各县平均人口是3万余人。留下的和迁走的相加，东越两王国人口的总和约略少于夜郎口数。由此看出，夜郎在秦汉南方少数民族中，是一个有庞大部落、人户殷盛的大实体。

在秦王朝存在的短暂期间里，夜郎国顺应历史潮流，和平地归于秦帝国的大一统。这一点，夜郎和当时的东南越人不同^⑤，与岭南的西瓯不同^⑥，与同在西南的侏都也不同^⑦。及至汉武帝继秦朝大一统的伟业，复对南方近海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开设郡县，夜郎地区不仅率先设置，而且是和平内属的典范。终汉之世，综观这里不是一个发生分裂的多事地区，夜郎国及与之处在这一地中的句町、进桑方国，先后为汉王朝罕有地诏封以极其显赫的王国地位^⑧。

据史载，秦汉西南夷的经济状况有“耕田有邑聚”的农耕类型，“随畜迁徙，毋长处”的游牧类型和“或土著，或移徙”的半农半牧类型。夜郎是属于农耕类型，生产力水准在当时的西南夷中处于靠前的位置。他们“筰路蓝缕，以启山林”，为开辟贵州高原一带艰苦创业，为日后这里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就历史的演化而言，战国秦汉时代，我国南方诸如巴、蜀、楚、吴、越、东瓯、闽越、南越等方国，灭国后其遗众在较短的时期内都融合入华夏民族，它们所在的地方全部或基本上在今天已是汉族地区。而夜郎故地的今贵州高原一带，则是生机盎然的多民族居住区，苗、布依、侗、水、仡佬五族以这里为主要分布地，彝、土家等族人口也不少。其中有的少数民族必定与古代的夜晚存在一定的源流关系。

夜郎在秦汉时代既是南方少数民族中一个大而显耀的实体，自有与此相应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多彩多姿的

古代文化的一部分，是当今贵州高原一带某些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头。如此等等，表明夜郎为我们多民族国家开疆守土，为中华民族及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不应磨灭的贡献。夜郎不是无足轻重的历史成员，这本身就是一个颇富学术价值的系统研究课题。

在历史上，汉王朝对于夜郎地区，是以和平内属、维持地方安定，从而巩固整个帝国的统一为总方针。以此为前提，对这一地区实施“优惠”的民族政策。在经济上是以巴蜀富饶的出产来支持对夜郎的开发，而对夜郎等则“毋赋税”。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针对夜郎等的具体情况，允许“以其故俗治”^⑨。即不强迫改变世代相袭的语言和生活习惯、意识信仰。并且在大一统的局势下，不强行按内地制度变更其社会政治、经济结构。

为促进夜郎地区经济的发展，汉王朝还迁徙内地豪民到此垦殖。他们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对夜郎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影响。而这些豪民及为其携带进入夜郎地区的汉族人口，随后则逐渐融合到当地少数民族人口之中。自此开贵州高原一带“夷”、汉民族间各方面融合渗透的先河，对这里两千年来不断迈向更新的文明，有着深远的意义。

意味深长的是，由于汉王朝对夜郎地区施行了比较进步的民族政策，由于进入这里的汉族人民和当地少数民族人民互相友善交往，所以，到西汉成帝河平二年（前27年），夜郎王国首领破坏地区安宁，为汉王朝诛除，其国人都对汉王朝此举给予拥护和支持。由此看来，夜郎的历史也是我们多民族国家历史上民族关系中闪光的一页。当地各族人民共同维护国家的统一，彼此合作和在各方面相互汲取，是其间关系的主流。无疑，探讨夜郎对于发展当代各族的兄弟情谊，巩固我们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完整，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开发，是有所增益的。

夜郎本身及与它有关的各个方面，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

唯其如此，对夜郎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专治古史地和民族学学者的重视。近10年来除我们在文献方面辑纂了《古夜郎史料汇编》^⑩外，各地学者们公开发表的研究文章共近百篇，超过了以往年代的总和，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扩展推进，取得了多方面的收获。

探求夜郎的困难，首先是要解除文献材料本身造成的困惑。汉武帝时，司马迁作《史记》，首纪夜郎。其后，班固在东汉章帝建初年间（公元76—83年）写成《汉书》，继采前史遗事，对夜郎作了续记。对《史记》，早在东汉时期，就有延笃因感内存“取之以旧俗风谣”，并已有残文断句，乃作《音义》为之解说^⑪。对《汉书》，亦在东汉更有服虔、应劭等人开始为注。到魏晋南北朝时，不仅对《史》、《汉》注家蜂起，并有常璩、范晔、郦道元诸人以前两书系指趣略举、结约未伸，分别撰《华阳国志》、《后汉书》、《水经注》，对夜郎的叙述由略显详。但这些后出之书与司马、班氏之书有牴牾之言辞，历代各家所作注文尤显杂说纷呈。何况事过境迁，政区更改、山川易名、民族流徙时有发生，而史籍或版本前后增损衍缺，或其中汉文古今音、义有变，或对少数民族称谓及语言译写各时期有异，致使后人对夜郎难以寻踪辨迹。对此，已有学者对诸古籍所记和前人杂说，究诂稽考而辨正是非，判剖义理而显其虚实，从而为研究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前人纪、注凌杂的障碍。

田野考古方面，在这段时间里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以贵州境内而言，考古工作者对战国末至秦汉夜郎地区的一批遗址和墓葬材料，经过科学的分析鉴定后，陆续有发掘报告或发掘简报发表。其主要者有威宁中水^⑫、赫章可乐^⑬、普安铜鼓山^⑭以及兴仁、兴义^⑮、修文等处^⑯。在贵州以外的故夜郎地区或其边缘，广西西林普驮、云南曲靖珠街等处，也发现属于这一时期的重要古遗存。为解决夜郎来源至关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

的遗存，在夜郎故地也有若干发现。如云南宣威^⑦和麻栗坡县^⑧；川南的宜宾、筠连、高县等7县、市^⑨；贵州的榕江^⑩、平坝^⑪；广西的百色^⑫等地皆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贵州毕节县境的瓦窑青铜文化遗址，更值得注意。其时代距今已有3千年左右，遗存中除含陶、石、骨牙器及房屋基础外，还有铜器数件及铜渣、石范^⑬，有力地表明早在那时，贵州高原就已透露出青铜文明的曙光。

在地面文化遗存方面，四川宜宾南部地区，贵州桐梓一带和关岭县境，还分别发现与夜郎有关的悬棺和崖壁图。应特别引起留心的是，这些新石器时代至秦汉的文化遗存，基本上都在贵州高原中心的贵阳西北面和西南面，印证了史籍中夜郎的好些政事发生在今川滇黔、滇黔桂交接地区的记载为不妄。也与众多研究者依据文献材料得出的好些见解，大体上是吻合的。

这段时期的研究，除了对文献材料取得初步的考证成就和对考古发掘所获开始运用外，有些学者还将民族学、音韵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加以配合。在这个期间中，史学界、考古学界和民族学界，对或起初先于夜郎、后又与之同世的百濮、百越、巴、蜀、滇、楚以及当时的南方少数民族，进行较有规模的同步研究，这些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为有的夜郎研究者汲取并反映在其撰论之中。

三

由于材料运用的渐广和方法上的有所改进，夜郎研究者们对夜郎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观察、分析和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对其中的族属、来源、名义、地理、后裔民族等问题，归根到底因目前条件所限，在短期内各家见解难以一致。但都共同摈弃了一些陈说，各自抒发己见而提出了一些颇有启迪性的新颖见解，并在异说

中隐含有近似成分。这自为此类问题的解决，起了先导作用。另一方面，在其它一些问题则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秦汉时代夜郎的社会形态，较一致地认为已处于奴隶制阶段，存在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及与它相应的上层建筑。对此时期夜郎地区各部的关系，也都认为本存在着约定俗成的联盟，后由中央政权法定为等级分明的统率关系。对秦汉王朝开发夜郎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并认定夜郎与中原及巴、蜀、滇、楚、南越地区在政治和经济文化上早有内、外在的联系。在夜郎地区的交通问题上，对通向南越地区的主要水道牂柯江究系今日何水，通向巴蜀地区的旱道经过的主要地点，亦取得了趋于一致的意见。对夜郎的习俗，大家认识略同，互为补充。从虽不完满而已初步解决，或纵然未解决但也取得进展的这两个方面看，应该说近10年来对夜郎的研究并非徒劳，而是富有成效的。

上述对研究对象诸种问题上呈现的两类情形中：研究者们相同或相似的认识显而易见；而众说纷纭的几个重要问题，由于本书选文较多，为方便读者检视，有必要梳理归并，并略辨其旨趣之异同。

（一）族属、来源和名义

夜郎的族属、来源及名称含义，相互密切关连，核心在于族属。

族属 诸家所论，有谢人说，仡佬族先民濮人说，越、濮、羌同为主体族说、彝族先民说，以及百越说数种。持谢人说者，认为夜郎来自周代徐淮夷中的谢人。持仡佬族先民濮人说者，认为夜郎、牂柯皆僚人之居地，僚人呼竹为“盖脑”，即仡佬的异写，而僚人即古濮人后裔。持越、濮、羌同为主体族说者，认为由周到秦汉百越系的僚人，南蛮系的濮人，今彝族先民的羌人，在夜郎地区都是主体民族。持彝族先民说者，认为夜郎由羌系的夷、

僂、濮和百越系的僚人3个主要民族联合组成,夷在其中处于首领地位,即今彝族先民。持百越说者颇多:其一为百越濮僚等同说,认为夜郎族属为百越,而濮人和僚人就是对越人的一种别称;其二为百越僚、濮两部分说,认为夜郎是由百越中按历史上的亲疏关系分为僚人和濮人的两个部分组成;其三为百越闽瓯骆说,认为闽、瓯、骆本越人共有的自称,在内部互为别称,夜郎地区各部名细究均含在此3种自称之中。

来源 概言之有土著说和外来说两类。持土著说者意见有二:有的认为属仡佬族先民的夜郎,本贵州一带的土著;有的则认为是由西周就存在于当地的古牂柯国,在春秋时解体后,由该方国首邑夜郎邑近旁的一个小邑据有其故地发展而来。持外来说者,人数颇众。其中:有的认为夜郎可上溯到西周之世,周王室以徐淮夷的谢邑封申侯,谢人不堪周人压迫而迁到黔中;有的认为夜郎与东南越人存在同源关系,他们源出东南沿海地区,始迁时期迄今近4千年;有的则说夜郎本江汉一带濮人,春秋晚期为楚人驱迫,迁入今贵州一带。

名义 由于对夜郎族属、来源的认识存在大、小不等的差异,对“夜郎”的含义相应地有不同的解说。有的持谢、浪说,释夜郎之夜乃谢之音转,郎古读如浪,是指溪谷之地,“夜郎”就是居于溪谷中的谢人。有的持僚人卜岁郎火说,认为古僚人中“有力者曰‘郎’”,卜岁郎火以夜晚作法,或即夜郎之称名来源。有的持源于山名说,认为古牂柯国首邑的今贵州安顺一带,左近有夜山、郎山,遂以“夜郎”名邑。而对此好些人则以“越骆”为解,但互有小异。有的说夜郎的夜字疑即“于越”的于字,是越人的语发音,而郎与骆字音近,故“夜郎”乃“骆”的音译;有的说“夜郎”与“骆”,是对越人语汇田野的缓、急两译,后来变音或异写作“僚”;又有的认为夜郎群团的民族名称是“僚”,“僚”、“骆”同声而译写可通用,而“夜郎”最初只是其中一个部落的

名称，后来凡是与之亲近者均被称为“夜郎”。

对夜郎族属虽研究者们歧见较多，但除一两位外，多数人的识见基本上是殊途同归。一般都具体地认为就是魏晋及稍后，尚生活于当地的“僚”、“濮”，尤以“僚”为集中。只是古百越系是否包含“濮”在多数民族学者中认识尚未一致，因而表述上粗显不同。至于夜郎来源和名义，或与族属不无牵连。大多数学者认定其族属为“僚”，亦即“骆”。而在我国民族学界，以它早先在东南地区多译写成“莱”，稍后在岭南又主要译写成“骆”，为古越语中山野的意思，是很具普遍性的认识^④。可见相当一部分夜郎研究者这方面的看法，和整个学术界对南方古族宏观研究得出的基本认识，颇为相同。

（二）与当代民族的关系

历百代之沧桑，夜郎后裔为当代何族或哪些民族与夜郎有一定的源流关系，研究者们持有古今不变和分化演进两类认识。

古今不变说 一些学者断定，夜郎遗民即今之仡佬族，也有个别学者认为，今贵州一带的彝族是夜郎遗裔。

分化演进说 有的学者认为，夜郎故土上的居民后来逐渐演变为仡佬族和布依族；有的学者又认为，现今的仡佬、布依、侗、水、壮诸族，与夜郎有程度不同的关系。

这些看法虽然互有出入，但不难比较出在当代民族中仡佬族与夜郎有较直接的源流关系，是具广泛性的认识。

（三）地理位置

夜郎的境域有多大，中心在何处，学者们提出了多种见解。

夜郎的境域 研究者们识见大致可分为相当于汉代牂柯郡一郡说、地跨包括牂柯郡在内的数郡说。数郡说的具体见解，主要有3种：（一）夜郎不仅有汉代犍为、牂柯、武陵三郡之地，

有时且越出此三郡之界；（二）夜郎在战国时的地域约当今贵州西部和西北部，云南东部和东北部，四川南部，广西西北部，今四川乐山、彭山、眉山、夹江也是古夜郎地，而西汉时的夜郎国境则包有犍为郡属县 5 个、牂柯郡属县 8 个和益州郡属县 1 个；

（三）古夜郎国极盛时的疆域范围，不仅有今贵州全省，北和西北还包及川南、滇东北，南抵今广西田林、南丹，东到湖南新晃，西至今云南曲靖、陆良，即含汉牂柯郡全境及武陵、犍为两郡的一部分。

一郡说的见解，也主要有三种：（一）夜郎之地为牂柯郡一县，南夷地区有数十部落与之地域毗连且族属相同，又以夜郎为首，故这一地区也是夜郎地区，汉时设为含 17 县的牂柯郡；（二）以今地理论，夜郎部落联盟集体的地域东起今贵州黄平一带，西北至贵州毕节县，西至今云南罗平、路南、弥勒及华宁以东，北有今贵州遵义，东南包括都江上游地带，西南经今广西右江上游过云南文山州而达红河州东南，即汉牂柯郡辖境；（三）夜郎的领域为今黔西南、黔西北、滇东北、滇东南和桂北一带，亦在汉牂柯郡境内。

中心方位 对夜郎地区诸家所见均相当辽阔，并都认为有一个起核心作用的部分。这个中心是其中何部，有且兰部说和夜郎部说。持且兰部说者认为，牂柯郡的首府在故且兰县，它自然是夜郎部落联盟集体的中心，且兰君是夜郎中最大的王，其地在今贵州麻江、福泉、黄平一带。夜郎部说，有 4 种不同的认识：（一）夜郎中心在战国庄蹻入滇和汉武帝时唐蒙入使夜郎两条路线的交切点上，即今贵州西南部的黔西南州及六盘水市一带；（二）夜郎中心即夜郎侯邑，应沿唐蒙所开陆道和牂柯江源流寻找，它在今云南东北角上的宣威、沾益一带；（三）夜郎的中心，只要确定了它所临的牂柯江相当于今天哪条水就能弄清楚，今西江及其上游红水河、北盘江即古牂柯江，现在的黔西南地区就是古夜郎的

中心；(四)夜郎王国直辖地的地理位置不能仅从临牂柯江确定，还应从庄蹻入滇路线、汉代犍为郡的设置、南夷道的修筑和邮亭的设立考虑，它在今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一带。

各家对夜郎整个地理范围的看法虽有不同，但十分明显的是都认为汉牂柯郡全境或其大部分属县地，即今贵州省境的绝大部分及与之相连的滇黔、黔桂交接地带属夜郎地区。对其中心所在虽似各持一端，但大多数论者不仅共有在汉夜郎王国直辖地的见解，而且各自指出的具体地域从黔西北、滇东北、黔西南到黔南，都是在为几乎所有研究者认定的夜郎地区内，并且同是紧缩到略偏于这个广大区域西面的一片彼此连接而稍呈弧形的地带。有的研究者虽力主夜郎联盟中心在今贵阳以东的黄平、福泉等汉故且兰县地，但在所撰同文中把汉夜郎王国直辖地定在今贵州关岭、晴隆一带，与其他人夜郎地区中心即夜郎王国直辖地在黔西南的论断也有稍同之处。可见各家对此所持观点实际差异有限，存在异中有同、互相接近的趋向。

四

迄于今日，对夜郎的研究已多年。设若这称得上是一个阶段的话，那么，这个阶段的显著特点便是经过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取得多方面的进展而使夜郎面目隐隐透露。但是要对它作清晰的“复原”，还要经历充分运用现成的条件和创造新的条件，在方法上作必要的改进并深化研究层次的新阶段。

在条件方面，最重要的是实物材料。现在好些现成的材料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夜郎和它所在地区的史前人群和文化，似有一定的连贯性关系。夜郎所在的今贵州高原一带，是我国旧石器时代远古人类化石或其文化遗存，发现较多并略具发展系列的地区。最早的已有50或60万年以上^②，最晚的距今也有1.3万年

左右^②。此外，在与贵州相邻的云南、四川、广西、湖南诸省、区，也多寡不均地发现远古人类化石或旧石器文化遗存。贵州和相邻省区的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在石器制作方法和类型上有一定的共同性，标示出至迟在此时生活在这一地带的居民有一定的血缘、基因的交流。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贵州境内除了前面提到的近10年内发现的平坝、榕江两县的以外，过去在威宁、赫章、毕节等县也曾发现多处。夜郎所在的牂牁故地的新石器文化，有的与本地的旧石器晚期文化有一定的承接关系，有的与东南沿海地区常见的同期文化有着完全相同的内容^③。史前考古的诸多重要发现，特别是那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虽是研究夜郎来源的物据，但多数研究者并未留意和使用这类可贵的材料。

秦汉时代夜郎地区的考古发现，以在广西西林普驮发掘的西汉前期句町部最高统治者的铜鼓墓最具研究价值。此墓用两大两小共4面铜鼓套合作葬具，人骨用数以万计的细粒绿松石连缀的“珠襦”裹殓，随葬品有汉式及富于民族色彩的铜、铁、玉石器4百余件，均甚精美。其详情发掘者已具报告公诸于世^④，实物图片不少也选入文物图册印行^⑤。然而，这一重大发现仍未能引起夜郎研究者们的重视。

当然，已知的地下出土材料是很有限的，今后还要尽力向地下寻“宝”，找到更多的准确可靠、强而有力的实物材料。但历史上的古族或古方国问题的基本解决，并不只取决于考古发现。如我国南方好些地区发现了成百上千的价值很高的有关当地古国、古族的遗存，而它们仍有不少大的问题悬而未决。就夜郎问题的解决来说，不仅需要为主的实物条件，并也要有其它方面的配合，才能产生理想的综合效应。

在研究方法方面，确实存在亟待改进的必要。这段时期众多的研究者充分发表了意见，可是对讨论对象未能审定阡陌，时、

空无明确界定，有的相同问题各家概念不一，对讨论的收效显然有损。论证分寸的把握也存在不足。如社会性质问题，至为重要的是劳动者的身分，即便从当时的人群中可以分辨出奴隶，但尚需证明奴隶或处于奴隶地位的人是最主要的劳动生产者，奴隶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是占居统治地位。此外此类问题涉及的社会大分工、上层建筑结构、手工行业生产等，有的文章的论述，亦似有失当之处。而探讨文论虽多，但一般是各顾己说，彼此鸣而不争，学术上批评与反批评的气氛欠浓，亦不能不是缺陷。

再者，在研究方法上还有自我禁锢的现象，没有密切注视我国古史、民族史研究的进展，特别是对南方古族、古国探讨的动态，不能给夜郎找到确切可靠的历史位置，得出的论断也不能较彻底地排除反证。以上之外，当今人们已日益认识到古史研究要取得突破性的成就，需要多学科协同。解决夜郎问题，应当进一步用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古地理学、比较语言学、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乃至理化、生物等方面，作综合性的探索。因为不同的大的古群体，在体质内、外部的特征和文化的结构上，是有所差异的。大抵如此，研究的层次才可以深化，使问题得以较透彻的解决。

尽管对夜郎的探求远未终结，但本书各文论都凝结着作者们付出的心血。大家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对未来者导乎先路，使对其全面情况的揭晓有日可盼。我们识见浅短，行文弛缩无序，取精用宏也有疏虞，谨此呈正于研究者及读者。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执笔人：朱俊明)